

## 佛教的出世精神與近現代中國佛教的 入世轉型

洪修平

南京大學「南雍學者」特聘講座教授

### 摘要：

佛教的「入世」並不是自身的「世俗化」，而是要發揚大乘精神，為現實的社會和人生服務。近現代佛教的入世轉型，淵源於大乘佛教的根本精神和佛教的中國化過程之中，但近現代中國佛教的入世轉型有著與歷史上的「入世」非常不同的時代境遇、豐富內涵、新的特點及歷史效應。歷史上，佛教的入世面向與佛教的中國化曾相依相助，並逐漸匯同而合流；在中國佛教的未來發展中，入世轉型、推進人間佛教的理論與實踐，與佛教的中國化仍將相輔相成、相互促進。如何堅持契機契理的原則，在入世發揮作用與堅守出世精神之間保持適當的張力，如何與現代科技和學術交流並參與到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鑑中，又繼續堅持佛陀智慧解脫的本懷和佛教中國化方向，這是中國佛教始終需要關注和解決的重要問題。

**關鍵字：**近現代佛教 出世精神 入世轉型 佛教中國化  
人間佛教

近現代是一個中西衝突、新舊交替的時代，世界局勢和中國大陸社會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變化，面對西學東漸、中西文化的碰撞和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作為傳統文化重要組成部分的中國佛教也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多重挑戰和機遇，同時也相應地做出了一系列或主動或被動的轉變，其中特別令人矚目、並對其後中國佛教的發展產生重大而深遠影響的，是佛教更多地面向新時代、新社會、新文化，更多地關注並參與到現實的社會和人生中，我將其稱之為入世轉型。這裡的入世，有其鮮明的時代特色和內涵，並非是說近現代之前的佛教只有「出世」而沒有「入世」；入世轉型，也不意味著近現代以來的佛教有入世關懷而沒有了出世精神。

近現代佛教的入世轉型，既是對佛教中國化的繼承，更是對大變革時代社會和文化的回應，也是中國佛教自我反思、自我革新的結果，它對中國佛教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推動了近現代佛教文化的復興，並一直影響到現當代海峽兩岸三地人間佛教的推展。如何在現代視域下，通過對近現代佛教入世轉型的歷史與現代的雙重解讀，來為佛教在今天和未來的發展提供歷史借鑑和啟示，使佛教在現代更好地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更好地發揮其精神性文化資源的作用，為當代精神文明建設做貢獻，是我們面臨的重要任務。

## 一、佛教的中國化與佛教的入世轉型

總體上說，近現代佛教的入世轉型，是佛教在傳統社會向現代轉型的新的歷史條件下，對佛教中國化的承續與創新，是佛教為了在新的社會文化環境中生存發展，並更好地展示其獨特價值、發揮其獨特作用的努力與開拓，通過與新時代的政治、經濟、宗教、科學、社會思潮、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協調互動，實現了自身在政教

關係、組織管理、思想觀念、佛法義理、僧伽教育、宗教實踐等方面的轉型和變革。

入世的面向，這本來就是大乘佛教基本精神的體現。創立於印度的佛教雖然本質上以出世解脫為根本追求，但大乘佛教自度度他、自覺覺他的根本情懷和上求菩提下化眾生的菩薩精神，更強調入世救度眾生。同時，雖然佛教認為人生是苦海，其根本宗旨就是要把人從苦海中解脫出來，但離苦得樂的終極理想，體現的是對永超苦海之極樂的嚮往，而佛教「自作自受」的業報輪迴的教義，更透露出了靠每個人自己為善去惡的實際努力來實現人生永恆幸福的追求，只是這種對永恆幸福快樂人生的嚮往和追求，在印度佛教中並沒有得到充分的彰顯，但它傳入中國後，在具有濃厚人文精神的中國傳統文化氛圍中獲得了新的生命力，並得到了充分的拓展。佛教的中國化在很大程度上，表現為對中國傳統文化重視人和人生的人文精神的融合與吸收，從而發展了印度佛教蘊涵卻未能充分彰顯的對現實社會人生的肯定。近現代佛教的入世轉型，即淵源於大乘佛教的根本精神和佛教的中國化過程之中，佛教的入世面向與佛教的中國化可謂是相依相助。

佛教的中國化和近現代佛教的入世轉型，都是佛教在中國傳播發展過程中契理和契機的具體體現。契理，即契合佛法的根本精神，合乎佛法的根本道理；契機，即隨順社會文化的變遷、時代的變化和大眾的不同需要而不斷地更新和發展，並應機接物，方便施教。從中國佛教的發展歷史來看，契理契機始終是佛教中國化的根本原則。就具體內容而言，佛教的中國化呈現出多面向的豐富多彩性，不僅表現在宗教信仰、哲學理論等方面，而且還表現在禮儀制度、組織形式和修行實踐等許多方面。就佛教中國化的途徑與方法

而言，也可以從佛典的翻譯、注疏和佛教經論的講習等不同的方面來理解。在思想理論的層面，漢地佛教的中國化主要通過了方術靈神化、儒學化和老莊玄學化<sup>1</sup>。其中，就中國佛教的入世化、人生化傾向而言，佛教的儒學化特別值得重視。

儒家思想是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主流和基礎，儒學鮮明的人文精神引領著中國傳統文化的主要特點和精神，也對佛教的中國化和入世轉型產生了重要影響。以儒家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具有很強烈的關注現實社會和人生的人文精神」<sup>2</sup>，這種精神在儒家思想中的突出表現之一，就是強調人的價值，重視對人的本質和人性的探討，強調主體道德上的自覺完善，形成了以性善論為主流的人性學說和反身而誠的道德修養論，並提倡積極入世，有著「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sup>3</sup>的豪邁氣概和社會人生擔當，其宣導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崇高精神，與大乘佛教入世救度眾生的菩薩精神，根本精神非常一致。儒家修齊治平的抱負和理想，成為大乘入世精神在中土生根



儒家思想是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主流和基礎，具有鮮明的人文精神。

1. 請參閱拙文：〈佛教思想理論的中國化與三教關係〉，《中國儒佛道三教關係研究》，北京：中國社科出版社，2011年，頁154-166。
2. 請參閱拙文：〈論中國佛教人文特色形成的哲學基礎——兼論儒佛道人生哲學的互補〉，《中國儒佛道三教關係研究》，頁143-153；〈論儒學的人文精神及其現代意義〉，載於《中國社會科學》，2000年第6期。
3. 張載：《近思錄拾遺》，《宋元學案》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頁769。

發展的重要文化土壤，佛教的儒學化則是大乘佛教在漢文化圈廣為傳播、大乘入世精神在中土發揚光大的重要路徑<sup>4</sup>。

正是在儒家的仁愛孝親和「修齊治平」積極入世的現實主義精神影響和引發下，中國佛教充分拓展了印度佛教本身蘊涵的卻又被整個思想體系窒息著的對人和人生的肯定，並以此為契機，而與儒道為主要代表的中華文化融合互補，最終成為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入世發揮著其獨特的作用。我們看到，外來佛教作為一種追求出世解脫的宗教，在儒家重人事、重心性和重視主體及其修養的思想影響下，將抽象的佛性與具體的人心人性結合在一起，極大地發展了中國化的佛性論和心性學說，並通過對主體自我的肯定而一步步走向對人的生活的肯定，由此確立了中國佛教「出世不離入世」、「入世以求出世」的基本特色。

從佛教中國化的實際歷程來看，中國佛教的入世化、人生化傾向由來已久，構成了印度佛教中國化的重要內容，也成為中國佛教的重要特色之一。在漢魏佛教的譯經中就講到「惻隱心」、「仁義心」，主張「治國以仁」，提倡「孝順父母」，歌頌「至孝之行」<sup>5</sup>，表現出對現世社會政治和道德生活的關注。隋唐佛教宗派的創立，特別是禪宗的出現，是佛教中國化初步完成的重要標誌。《壇經》提出的「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兔角」<sup>6</sup>，既奠基了禪宗入世化傾向的基本特色，也為近現代以來的佛教入世

4. 請參閱拙文：〈佛教的中國化與中國特色的佛教文化——兼論佛教的儒學化與大乘菩薩精神〉，載《佛學研究》，2022年第1期。

5. 以上引文見《六度集經》，《大正藏》第3冊，頁27下、頁6上、頁49上、頁25上。

6. 洪修平解讀：〈六祖壇經·般若品〉，《壇經》，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20年，頁89。

轉型和人間佛教運動，提供了重要的理論資源和思想基礎。<sup>7</sup> 宋代以後，中國佛教的入世化、人生化傾向表現得更加充分，大慧宗杲的「世間法則佛法，佛法則世間法」<sup>8</sup> 幾乎成為佛教界的普遍共識，憨山德清更提出「捨人道無以立佛法」，其「所言人道者，乃君臣、父子、夫婦之間，民生日用之常也」<sup>9</sup>，主張「出世」的佛教通過中國化終於「入世」面向人生，依「人道」而立「佛法」了。

佛教的中國化和入世化這兩個有所不同的面向，在歷史的長河中逐漸匯同而合流。中國佛教的入世化、人生化傾向，從佛教自身的發展來說，是大乘佛教的入世精神在中國社會文化歷史條件下的進一步發展。大乘佛教的「世間與出世間不二」等思想，為佛法與世間法的溝通提供了可能，而中國佛教則在傳統文化的影響下，使這種可能成為現實。換一個角度看，中國佛教所宣導的「出世不離入世」，實際上也是印度佛教的「出世精神」在中國文化中的一種特殊表現。

由此可見，就歷史而論，中國佛教的近現代入世轉型，其實是對佛教中國化的承續，是對唐宋以來佛教入世化傾向的進一步發展，而並不意味著近代之前的中國佛教仍然完全是出世的，也不意味著近代之前的佛教沒有入世的向度和精神，而是意味著近代之前的佛教存在著種種不合理的、落後的、甚至是扭曲的「出世」面向，脫離現實的社會和文化，疏離於政治體制之外，正是基於如此「出世」的宗教之現實，太虛大師等許多有識之士大聲疾呼革新佛教，

7. 請參閱拙文：〈《壇經》的人間佛教思想及其理論特色〉，載《河北學刊》，2011年第6期。

8. 《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27，《大正藏》第47冊，頁929下。

9. 《憨山大師夢游全集》卷45，《卍新纂續藏經》第73冊，頁769上。

並結合時代的需要而為改革佛教做出了不懈的努力<sup>10</sup>。

但就現實而言，中國近現代佛教的入世轉型，又有著與歷史上的「入世」非常不同的時代境遇、豐富內涵、新的特點及歷史效應。就其歷史境遇而言，它是在明清佛教衰落腐敗、大乘精神失落而又遇國家民族危機、西方科學民主思潮衝擊的多重壓力下尋求的自救，比起佛教初傳遭遇儒道的抵制而求生存發展，情況更為艱難複雜。就其內涵而言，入世不僅是與社會文化和民眾生活的結合，更須在回應轉型中的現代社會、科學理性、民主政治、學術研究等提出的一系列挑戰中，尋找到自己的定位與發展空間，在繼承發展傳統佛教入世精神的同時，尋求新時代的拓展和創新。由此，我們看到近現代中國佛教的入世轉型，呈現出曲折的歷程和多向度的路徑，表現出區別於傳統佛教入世的新面貌、新特點，並對中國佛教的發展產生重要影響，推動中國佛教走上了人間佛教的道路。

## 二、歷史與現代的雙重變奏

近現代佛教入世轉型，有著深厚的歷史淵源、特殊的時代境遇和艱難的曲折進程，既有生死存亡的自救，又有新機遇下的探索，既有古今碰撞中的觀念調適，又有西風東漸下的自我定位，而多元信仰格局下的文化判教，則成為近現代佛教入世轉型的內在動力和外在助緣，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佛教入世轉型的發展。

就歷史淵源和時代境遇看，佛教在歷史與現代的雙重變奏中實現的入世轉型，一方面是對大乘佛教入世精神和傳統中國化佛教的

10. 請參閱拙文：〈太虛近代佛教的革新運動及人間佛教的提倡〉，載《佛學研究》總第3期，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1994年出版；〈太虛大師與當代的人間佛教〉，載《佛學研究》2017年第2期。

繼承和進一步發展，上千年佛教中國化的歷史進程及其方式和途徑、經驗與教訓，都為近現代佛教的入世轉型提供了歷史借鑑，特別是中國化佛教的入世化、人生化、人間化傾向和人文主義精神，為近現代佛教入世轉型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礎，成為近現代人間佛教的重要思想來源；而另一方面，清末民初傳統社會轉型，佛教自身流弊叢生、遠離世間和現實人生而成為鬼神佛教、死人佛教、經懺佛教，以及西方列強的入侵、基督教的傳播、戊戌變法、辛亥革命、新文化運動、「廟產興學」風潮等種種時代境況，則構成了近現代佛教入世轉型的現實內因和外緣。

就某種意義上說，近現代佛教入世轉型，是對傳統佛教優良傳統的繼承，和對傳統佛教在發展中出現的各種流弊的糾偏和反正。由於時代的不同，近現代佛教的入世轉型，有著與歷史上傳統佛教中國化不一樣的路徑、方法與表現形態，但傳統社會、傳統文化和傳統佛教主體的歷史承繼性，又決定了近現代佛教入世轉型與傳統佛教中國化之間具有一定的歷史延續性，例如政教關係都沒有宗教至上或政教合一，經濟和管理方面都具有寺院自養、自我管理的特徵，宗教理論與實踐方面，近現代人間佛教就是在傳統中國化佛教人生化、人間化基礎上形成並發展起來的。

具體來看，近現代佛教的入世轉型對佛教中國化的承繼與創新，表現在許多不同的方面。例如在方式與路徑方面，表現為從儒學化、老莊玄學化到現代學術化，從宗門叢林化到組織民主化，以及從方術靈神化到祛魅理性化、社會人生化；在宗教思想和觀念方面，表現為從強調「自性自悟」「不離世間」到突出人格完善和服務社會、從「觸事而真」「隨緣任運」到「人菩薩行」「為眾生服務」、從「運水搬柴、穿衣吃飯」的平常日用到「入世化俗」改良

社會；在組織制度方面，表現為從依附王權到依法管理、從宗門叢林管理到民主組織方式、居士組織從僧團外護到自主活動；而在實踐方式上，則表現為從偏重頓悟心性到強調學修結合、從傳統叢林教育到現代佛學院教育、從地方性的濟貧賑災和恤孤養老等傳統慈善到社會性的跨地區的包括扶貧助學和生態環保廣泛內容的現代慈善；等等。

近現代佛教的入世轉型並非一蹴而就，而是經歷了上百年複雜而曲折的發展，大致經歷了清末民初的初啟、民國時期的艱難探索、新中國成立後兩岸的曲折推進，

以及改革開放後入世轉型實踐的全面展開等不同的階段。在清末民初，有鑑於傳統佛教的衰落，一批有識之士大聲疾呼改革佛教，發起了佛教改革運動，他們結合時代的需要，為振興佛教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並初啟了近現代佛教的入世轉型。主要活動包括清末楊文會創辦金陵刻經處和祇洹精舍，維新思想家研究佛學、宣導新學，佛教界為應對廟產興學的風潮而興辦僧教育、創建全國性佛教統一組織，以及太虛法師提出佛教「三大革命」的主張等。到了民國時期，民國政府的廟產興學政策導向，迫使佛教界積極組織「中國佛教會」等全國性的佛教統一組織以維護自身的權益，並探



金陵刻經處



祇洹精舍

索對僧制的改革以振興佛教。宗教信仰自由和公民結社自由等的提倡，則推進了傳統居士組織的現代化。

伴隨著近現代西方文化的傳入，佛教的傳播弘法方式也發生變化，佛教圖書大量印刷流通，上百種佛教刊物紛紛出版發行，各類佛學院先後創辦，新式教育和現代佛教學術研究逐步開展，現代慈善事業也有很大發展，廣播電台、灌製唱片等新興方式也開始被佛教界運用。太虛宣導的「教理、教制、教產」三大革命的佛教革新運動雖然沒有取得完全的成功，但以其為代表的佛教革新派從佛學觀念、佛教僧制、新式教育、弘化方式等方面進行的艱難探索，卻對近現代佛教的入世轉型產生了深刻影響，許多方面也都為之後海峽兩岸佛教所繼承和發展，特別是面向現實社會人生的「人間佛教」思想和實踐，逐漸成為近現代佛教的主流。值得一提的是，抗日戰爭爆發，在救亡圖存、民族危機的關鍵時刻，中國佛教界積極投身抗日救國運動，客觀上有力促進了整個佛教的入世轉型。

新中國成立後，中國佛教的入世轉型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雖然期間也波折眾多，特別是「文革」十年一度受到嚴重挫折，但改革開放以後，中國漢傳、藏傳和南傳三大系佛教適應社會主義新時代的發展，出現了欣欣向榮的大好局面。二十世紀五〇年代，巨贊法師重提佛教的「生產化」和「學術化」，推進了新時代佛教的建設。全國統一的「中國佛教協會」和各省、市、自治區地方佛教協會在政府支持和佛教界的共同努力下順利成立，在推進佛教制度改革、組織佛教徒參加各項活動、促進佛教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和國際友好交流等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中國佛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在完善自身建設的同時，積極參與各項國家文化建設、慈善事業，成為中國佛教入世轉型的重要方面。當前，中國佛教正在繼

續堅持佛教中國化方向，努力在新時代通過推進人間佛教的理論和實踐而自利利他，實現人間淨土。入世轉型的中國佛教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要力量。

在台灣地區，1949年以後的佛教界，先是在戒嚴體制下致力於消除日本佛教對台灣的影響，恢復和重建傳統中國佛教，後來隨著台灣經濟的起飛，佛光山和慈濟功德會等新興佛教團體逐漸發展起來。在這過程中，人間佛教的思想和實踐逐漸成為台灣佛教發展的主流。當前，海峽兩岸的佛教文化交流與互鑑，則成為中國佛教發展的重要助力，並對促進祖國統一具有積極意義。

### 三、入世轉型與走向現代和未來

近現代中國佛教的入世轉型，推動中國佛教由傳統走向了現代。孕育於佛教中國化進程中的人間佛教的理論與實踐，也在海峽兩岸得到了充分拓展，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中華優秀佛教文化在推動社會文化發展、豐富大眾生活、開展國際文化交流等各個方面都發揮了積極作用。

當然，近現代佛教的入世轉型也存在著一些值得關注的問題。例如人間佛教的理論與實踐在現代和未來的推展中，如何既適應時代的需要、跟上時代的步伐不斷與時俱進，又能始終保持自己獨特的精神，彰顯自身獨特的價值？如何始終堅持契機契理的原則，在入世發揮作用與堅守出世精神之間保持適當的張力？如何與現代科技和學術交流並參與到世界文明互鑑中，又繼續堅持佛陀智慧解脫的本懷和佛教中國化方向？

「入世」並不等於「世俗化」。佛教「入世」是要發揚大乘精神，為現實的社會和人生貢獻智慧，這就需要與世俗社會和世間文

化相處，與之相適應，才能更好地發揮積極作用。化導世俗而不是自身世俗化，這需要不斷總結經驗和教訓。近現代以來的佛教入世轉型，為了適應社會文化的急劇變化而圖生存、謀發展，因而出現了清末民初附會近現代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論證佛學不違背現代科學和自由民主思想，面對廟產興學風潮，又學習基督教辦學，同時積極探索僧伽制度改革，開展各項社會公益活動，一直到市場經濟時代，一度出現了過度的商業化現象，這些都表明，如何在適應社會文化環境中推進佛教自身的理論和實踐，如何入世而不世俗化，始終是佛教入世轉型需要關注和反思的重要課題。

目前，海峽兩岸或多或少都存在著兩種傾向，一是過分強調順應現代社會文化環境而大力發展文化、教育、慈善等世俗事業乃至商業化活動，如此則易將佛法混同於一般的世間法而難以彰顯其獨特的價值；二是認為只有傳統佛教才是真正的佛教而趨向與社會保持距離。這兩種傾向，其實都不利於佛教發展並發揮其在當代社會的作用。

回望歷史，中國特色的佛教在中國化進程中形成發展，佛教的入世轉型在社會發展和大眾的需求中不斷推進；展望未來，中國特色的佛教、人間佛教的理論與實踐，也將在堅持佛教中國化方向中走向新的輝煌，並將進一步推進佛教的中國化。在中國佛教的未來發展中，入世轉型、推進人間佛教的理論與實踐，與佛教的中國化將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

堅持佛教的中國化方向，繼續推進並深化佛教的中國化，必須持續加強對中國文化的認同和對中華民族的認同。歷史表明，佛教的中國化、佛教的入世轉型和人間佛教的理論與實踐，是文明交流互鑑的成果，因此，中國佛教在未來的發展中，也需要繼續在文明

交流互鑑中吸收世界人類文明的成果，以不斷豐富中國特色的佛教文化。中國特色的佛教在歷史上是對儒道等中國固有文化的融合中形成的，也將在對中華文化的認同及與其他文明交流互鑑中進一步繁榮，並對世界佛教和人類文明做出新的貢獻。

在堅持中國化方向的未來發展中，也需要加強對佛教入世轉型和人間佛教的研究，並通過這種研究深化對中國特色佛教文化的研究，通過對佛教中國化歷史經驗的總結和對中國佛教文化特色的把握，來堅持佛教的中國化方向，增強文化自覺、文化自信，從而為佛教的入世轉型、入世發揮積極作用提供堅實的思想理論基礎。同時，佛教的入世轉型和人間佛教自身的理論與實踐，也需要在堅持佛教的中國化方向中不斷得到加強和完善。

由於佛教既是一種宗教，又是一種文化，宗教對信眾有絕對的意義，文化則對所有大眾，包括非佛教信徒，都有普遍價值。因此，中國佛教在當代社會及其在未來的發展，也就有兩個基本向度：一是作為宗教，承擔起延續佛陀慧命的責任和使命，二是作為文化，為全體社會大眾提供精神文化資糧。作為宗教的佛教，要堅守它的宗教性、神聖性、超越性，這是延續佛陀慧命的根本；作為文化的佛教，則要通過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使之成為全民族、全人類共用的文化資源。<sup>11</sup>

中國佛教文化雖然是一種宗教文化，但作為人類文明的重要成果，是一種重要而寶貴的精神性文化資源，它能夠也應該為人類的精神文明建設提供滋養，在人類的精神世界發揮更大的作用。<sup>12</sup>

11. 請參閱拙文：〈重提佛教既是宗教，又是文化——兼論傳承發展中國佛教文化的兩個向度〉，載《世界宗教文化》，2018年第2期。

12. 請參閱拙文：〈發揮中國佛教精神性資源的積極作用〉，載《中國宗教》，2015年第8期。



佛館菩提廣場千人茶禪活動，由小小茶師引領民眾品茶。（郭韋綺／攝）

例如，在自然環境惡化、社會道德失範、人的精神空虛等各種社會和人生問題層出不窮的現實面前，佛教所提倡的不執著、去貪欲和自淨其心、智慧解脫等，都能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發揮更大的積極作用。而有些哪怕是宗教教義，例如萬法無常和業報輪迴說，如果經過「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其中所蘊涵的發展變化的觀念和每個人都必須對自己的行為負責，要承擔道德責任和法律後果，也能對每個人產生積極的意義。但佛教的文化資源要轉化成社會普通大眾喜聞樂見、對社會和人生真正產生正能量的作用，這還有待於學界和教界、研佛者和修佛者的共同努力。

當然，作為宗教的佛教和作為文化的佛教，其實是一體兩面，不可分割的，但兩者各有所側重，它們可以相輔相成，互相促進。因此，教界、學界和政界攜手合作，更好地傳承發展中華優秀佛教文化，這是中國佛教在當代和未來發展的重要路徑和方向。